

孫中山病逝考述(上)

莊 政

馮玉祥佩服孫中山

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，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。會期十天，在此期間，曾做了若干重要的舉措與決議。擔任主席的總理孫中山先生曾講述：中國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、組織國民政府案，並提出國民政府建國大綱、「主義勝過武力」、民生主義真義、大會宣言旨趣及開始演講三民主義。籌辦黃埔軍校、通過大會總章等。經過這次改組後的國民黨，特別重視嚴密組織、加強宣傳、建立革命武力、整飭革命紀律，精神面目，為之丕變。在中國現代史上，這是一樁非常重要的大事。

就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第三天——元月二十三日，中山先生特將親筆題詞的「建國大綱」，囑托他的襟兄孔祥熙贈送北京陸軍檢閱使馮玉祥。馮對創導辛亥革命的孫中山先生心儀已久，及讀此一重要的革命文獻，深受感動，尤表欽慕！蓋馮玉祥在北方軍閥中為一有心人，生活樸實，作風平民化，治軍以嚴明見稱，甚得民心。民國十二年底他已在研究蘇俄國情，室內懸有列

寧像，由基督教而轉慕社會主義。當時張作霖、段祺瑞的支持者為日本，馮玉祥的支持者為蘇俄。而在廣州的國民黨正採取「聯俄容共」的政策，與馮早已有所接觸，也是極其自然的事。

北方政局一大改變

馮玉祥對吳佩孚的黷武主義及驕縱跋扈，一向不以為然；而第一次直、奉戰爭時，他支助吳佩孚有功而未得賞；後來僅得一「陸軍檢閱使」的空銜，一任閒散，坐困北京，其內心極為苦悶與憤懣。因此，很想找個適當的時機，把曹錕、吳佩孚趕跑。民國十三年九月十八日，曹錕下令討伐張作霖，吳佩孚自任討逆軍總司令，馮玉祥被任為直方第三軍總司令，擔任熱河方面的軍事；吳佩孚自將第一軍當榆關一路。及吳的部隊全部開赴前線，後方空虛。而馮至前敵，遲徊不進，去電北京索餉，言詞至為憤激。十月九日，榆關戰事最劇烈時，馮又發一通電，痛詆曹錕、李彥青，曹錕、吳佩孚頗不自安。逾十日，馮以北京空虛，有機可乘，趁夜秘密乘程回京，北京警備副司令孫岳係國民黨員，事前早有默契，開城門

迎入。十月二十三日清晨二時許，馮軍未發一槍，未廢一彈，佔領北京各要地，包圍了總統府，將曹錕幽禁起來，吳佩孚腹背受敵，倉惶逃竄武漢。曹、吳政權垮臺，閣員星散。遂由馮玉祥、孫岳、胡景翼、米振標及所屬各師旅長等聯名通電，主張停戰。略稱：

「國家建軍，原為禦侮，自相殘殺，中外同羞。執政者苟稍有天良，宜如何促進和平，與民休息。迺者東南釁起，延及東北，動全國之兵，枯萬民之骨，究之因何而戰？為誰而戰？主其事者，恐亦無從作答。玉祥等午夜徬徨，欲哭無淚，受良心之驅使，為弭戰之主張，爰於十月二十三日決意回兵，並聯合所屬各軍，另組中華國民軍，誓將為國民效用。如有弄兵好戰，殃吾民而禍吾國者，本軍為縮短戰期起見，亦不恤執戈以相週旋。至一切善後問題，應請全國賢達，急起直追，會商補救之方，共開更新之局。多難興邦，或即在是。」

曹錕於次日(二十四)即被迫下野，並將清代廢帝溥儀從故宮驅逐。張作霖乘機入關，段祺

瑞也東山再起。馮玉祥與奉、皖兩派協商，推段祺瑞爲「臨時執政」。

中山先生與張作霖、段祺瑞一向有所聯絡，馮玉祥也表示服膺三民主義，孫岳、胡景翼本爲國民黨黨員，至是紛紛電請孫先生入京，主持政局。惟張、段聯名致電其北上，一以結交開國元勳、革命首領，故作姿態，欺騙羣衆；一以借此以分化革命陣容，企圖減少其在政治上的阻力。

是否北上曾詳計議

一個十分尖銳的難題橫在中山先生的面前：到底是否答應他們的邀請北上呢？還是不去？許多黨人堅持否定的態度，他們認爲跟滿清餘孽，帝國主義的走狗——北洋軍閥共謀國事，無異與虎謀皮，南轅北轍，無論如何，那是談不出什麼名堂的。段祺瑞是袁世凱的嫡系主將，袁那套謀詐權術，段欲重襲故智，弄得一清二楚。袁以武力強姦民意，段亦以兵變威脅國會；二次革命前後，袁買兇手暗殺宋教仁於先，又陰派暴徒謀刺孫先生於後（民國三年三月下旬袁派遣兩名刺客由釜山至日本，企圖暗殺中山未逞。）誰敢保證反復無常、心狠手辣的段祺瑞也不來這一手呢？

經過了再三的思考比較，中山先生認爲北上爲上策，因爲在北方的同志多年的經營，已有所成就，他們迭次電請北上，不能使他們失望。再說北上大可宣傳革命主義，進而促成全國和平統一的機會。何況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後，已有一個可靠的革命政府在廣東作爲根基，還有一些頗具實力的北伐軍作爲憑藉。基於上述種種理由，

乃於十月二十七日，電復馮玉祥、段祺瑞，允即北上。當時仍有許多黨員認爲北方的時局動盪不安，形勢甚爲險惡，力勸取消此行。中山先生回答說：「你們如以大元帥來衡量我，這次我北上的確很危險；但是如以革命黨領袖來衡量我，那麼，這次北上實在沒有什麼危險可說。」他的意志是如此的堅定，大家自然也就無話可說的了。不過他並非不了解段祺瑞之爲人，因而在心理上早已作好準備：段祺瑞「如果用軍人的資格，在會議上專橫，不讓大家公平討論，我便馬上出京，請他們直截了當去做皇帝」。他想：即使談不成功，正好揭露段祺瑞的真面目，使人民越發認清軍閥的本質。至其個人的安危，他曾一再表明了坦然的態度，他說：「我這次往北方去，所主張的辦法，一定是和他們的利益相衝突，大家可以料得我很危險；但是我爲救全國同胞，求和平統一，開國民會議，去冒這種危險，大家做國民的人，便應該做我的後盾。」他在準備北上和談之時，並囑北伐軍由贛州向吉安挺進，旨在攻下武漢，和北方的國民黨軍呼應，如此當可爭取優勢，有助於和談成功。

發表宣言提出主張

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一日，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舉行第十二次會議，由中山先生主持，出席胡漢民、汪兆銘、廖仲愷、伍朝樞、邵元沖、譚延闓、鮑羅廷。決定孫先生「離粵北上宣言爲統一中國。先往上海發表主張，如北方同意，然後與之合作。」同時，馮玉祥、王承斌、胡景翼、

孫岳來電，促請早日北上。三日，至陸軍軍官學校作告別之訓話。四日，決定北上，令胡漢民留守廣州，代行大元帥職權；譚延闓辦理大本營事務，主持北伐軍事。十日，發表北上宣言，主張速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。十四日，自香港開航，赴上海。十七日，抵上海，招待記者二十餘人。一日本記者問云：「昨日上海字林西報發表短論一文，討論先生到上海居住的問題。大意說先生是現在廣州大本營的大元帥，一舉一動，當然負有政治上的任務。而上海租界完全係商務性質，負政治上任務的大元帥，到這完全屬於商務性質的地方居住，是否相宜？這似乎爲一大問題，應詳加研究。」原來當中山先生抵達上海之前，英國人在上海辦的「字林西報」發表了一篇文章，意圖抵制他進入租界，竟然叫嚷：「上海不需要孫中山，應阻止他登岸。」而英國的「大陸報」竟悍然叫囂「要驅逐孫中山出上海」；「絕不要理睬孫中山所提出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」等等。這顯然是極不友好的表示，暴露了帝國主義者的猙獰面目。而日本記者的問話，竟然在挑撥上海各國僑民，羣起反對孫先生在上海登岸居住。

中山先生義正辭嚴地說：「現在上海雖爲租界，但根本上還是中國的領土。我是這領土的主人，他們外國人都是客人；主人在自己領土之內，行使職權，要怎麼樣便怎麼樣，他們做客人的決計不能橫加干涉。」

正當千千萬萬的上海市民在大街上熱烈歡迎孫先生時，法租界的巡捕悍然上街驅散羣衆隊伍

，恐嚇他不得在上海從事政治活動。但他決不爲任何威力所屈服。十九日，在莫利愛路二十九號寓所，舉行茶話會，招待中外記者卅餘人。他發表重要的演說，歷時一小時半，宣布時局主張，說明這次北上的目的，主張「和平統一，召開國民會議」。他堅決而明確地指出：「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，就是在軍閥和那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。我這次北上，有兩個目的：一爲召集國民會議，目的在對付軍閥；一爲廢除不平等條約，目的在對付帝國主義者的侵略。要打破了這兩個東西，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，才可以長治久安。」同時，他又沉痛地指出：「不平等的條約是什麼東西呢？就是我們的賣身契！我這次到北京去，講到對外問題，一定要主張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，收回海關、租界和領事裁判權。」「我們中國以前十三年，徒有民國之名，毫無民國之實，實在是一個僞民國。這兩三年來，曹、吳更想用武力來征服民衆，統一中國，他們這種妄想，到近日便完全失敗。這個失敗事實發生了之後，就是我們人民講話的極好機會，我們人民應該不可錯過這個機會，放棄這種權利；若是我們放棄這種權利，便難怪他們武人講話，霸佔這種權利。」

中山先生在上途中連續發表上述的政見深得人心，獲得了廣大羣衆極熱烈的擁護與支持。嗣據報告，得知上海與北京往來的交通，因受戰事影響而斷絕。津浦鐵路既久不通，而由上海往天津的輪船，搭客非常擁擠，在兩週以內的各船頭等艙位，均經預定客滿。後來祇好乘船從上海

先到日本，繞道前往天津。並希藉此時機，向日本宣傳對時局的主張，同時會晤日本舊友，徵詢日本國民對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意見。旋接馮玉祥電，速請孫先生北上。

張作霖來訪的態度

十一月二十一日晨，中山先生偕夫人宋慶齡女士、副官馬湘、黃惠龍等登日本輪船上海丸，隨員相繼而至，離上海，赴日本；二十三日，抵長崎；二十四日，抵神戶；二十八日，在神戶講演「大亞洲主義」；三十日，離神戶，赴天津；船過東海，遇大風浪；及渡黑水洋，衆皆暈船；黃昌毅觀察中山先生氣色，頗現疲憊，似有病容。十二月四日，抵天津，光在碼頭迎接的羣衆就有兩萬多人，市民自動張燈結綵，燃放鞭炮，竭誠歡迎。時值歲暮，天氣酷寒，中山先生與歡迎羣衆相見甚歡，脫帽頗久，已被風寒所侵。因天津法租界領事拒絕孫先生等一行在其租界通過。乃偕夫人宋慶齡及同行者乘車前往日租界秋山街張園（即武昌起義時，逃亡的清將張彪自建的寓所），作爲行館，接見各界代表，並與張作霖代表其子張學良談話。下午三時許，乘車往河北曹家花園拜訪張作霖，答謝其歡迎之意，暢談一個多小時。在座者有張學良、楊宇霆、吳光新及葉恭綽等人。稍事寒暄，張作霖開頭就說：「孫先生！我是個粗人，今兒坦白地說，我是捧人的。我今天能捧姓孫的，就可捧姓孫的。但我反對共產，如共產實行，雖流血亦所不辭。」快人快語，顯見誠意。可是段派聞後，頗表不快，因而碍

及了孫、段的合作。等到主、客分手後，張作霖跟汪精衛說：「我從前以爲孫先生是個什麼難說話的人，今日才知道他是一個溫厚君子。祇是北京各國公使都不贊成孫先生，大概因爲孫先生聯俄的緣故。你可否請先生放棄他聯俄的主張，我張作霖身上，包管叫各國公使，都要和孫先生要好的。」因爲當時張等正與外交團商談，以尊重不平等條約，作爲承認執政政府的交換條件，所以才提出此議。而廣州的革命政府於試與英、德聯絡，俱無合作之可能後，乃采「聯俄容共」政策，正與張等主張背道而馳，自難協調解決。

感受風寒發熱湧汗

中山先生生長於中國最南端，氣候炎熱，已成習慣。性至畏寒，及抵津沽，天氣嚴寒，屢爲風寒所侵，且經長途勞頓，身體漸感不支。回張園行館後，身體即發冷發熱，患重感冒，肝胃作痛，病勢嚴重。當晚各界在張園舉行的歡迎會，未克出席；一面延請德國醫生石密德診視，祇知已患感冒，尙未察覺肝病。後來，前大總統黎元洪來訪，探視病情後，建議食用白魚粥，因其特別適合胃病。中山先生樂於採納，依方烹食，取用部分，略呈效驗，其餘則留至下午。不料膳後即嘔吐大作，周身冒大汗，侍從人員李榮以毛巾代拭，一連竟濕透兩條毛巾，可見身體虛弱，病情嚴重。當天晚上，中山先生素食水果，侍從人員以醫囑少食水果應對，但他非要水果，不與不休，勉強吃了水果，尙無異狀。到了第二天清晨六時起床，精神稍微好轉，病情似有起色。他跟李榮

說：「日本醫生告訴我不要吃水果，而現今我吃完水果後，病勢已見減輕了，如果日本醫生來看病時，不必告訴他呀！」詎當天下午肝痛暴發。

溯自到天津的第二天，張作霖特往張園行館回拜。中山先生正在靜臥中，由於醫生戒勿勞動，仍須多加休息。隨員走出來表示謝絕會客。張作霖無視於他們的有意擋駕，却昂然澗步而入，邊走邊說：「我今天向孫先生說話，孫先生可以睡在床上，不必回答。」接着，他便利勸中山先生不要反對外國人，因為外國人都是不好惹的；而各國公使非常反對「聯俄容共」政策，他願意代孫先生疏通和帝國主義的關係。並且一廂情願地表示：「這件事包在我張作霖一個人身上，一定可以成功。」中山先生聽了這番話，覺得好氣又好笑，他身體不舒服，也未加辯解。

面斥段祺瑞的代表

約過兩週後，即十二月十八日，在北京執政的段祺瑞也偽示友善，派葉恭綽、許世英到天津來探視病況，並表歡迎之意。他們還以代表的名義，送給中山先生銀杯等禮物。而其真意却要孫先生說話平和些，不要過於激烈，免得導致「列強干涉」。中山先生及知段政府對各國公使有所謂「外崇國信」的保證，意即表示尊重不平等條約，非常氣憤。立即追問：「外交團要求尊重條約，聽說執政府已照會回復應允了，是真的嗎？」葉、許回答，確有此事，不過照會還未送出。中山先生聞後，便從病榻上霍然而起，勃然大怒，聲色俱厲地說：「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，你們在北京，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你們要升官發財，怕那些外國人，要尊重他們，為什麼還來歡迎我呢？」中山先生還從病榻旁的書堆上拿起一份當天報紙遞給他們看，報載段的宣言，竟有「外崇國信」等字樣。意即承認列強幾十年來強加諸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，以維持它們在中國的既得利益和統治特權，藉圖換取外國承認執政府。這顯然是有意跟中山先生所主張的廢除不平等條約作對的。這就難怪引起他的震怒了，他在病榻上極憤激地說：「我明天就到北京，在那裡反對段某，看他能把我怎麼樣？」又說：「假如不倒帝國主義，我就不革命了。」葉恭綽、許世英聞後，無言以對，悚然而退。

北京盛迎發現肝病

中山先生感情激動，肝病加劇，幾經醫治而無大效。旋於民國十三年除夕下午乘火車抵北京，受到各界非常熱烈的歡迎，在北京火車站上參加歡迎的各界羣衆超過十萬人以上，熱情洋溢，盛況空前。從北京前門車站直到北京飯店（定爲行館）沿途中各界列隊歡迎，人山人海，場面壯大，也有十萬人以上。北京大學的學生軍自動參加維持車站秩序者有一百廿餘人，從上午八時四十分站崗，直到下午四點，未進飲食，而無一人離開，甘受饑寒交迫之煎熬，愛國青年，盛情可感。孫先生在車中接受歡迎，精神爲之一爽。

前往前門車站歡迎的，包括北京執政府全體閣員、各部院、軍、警界首長、各大學校長等，盛況空前。中山先生進入北京飯店後，依着病榻，發表書面談話云：「中華民國主人諸君：兄弟此來，承諸君歡迎，實在感謝。兄弟此來不是爲爭地位，不是爲爭權利，是特來與諸君救國的。十三年前兄弟與諸君推翻滿洲政府，爲的是求中國人的自由平等。然而中國人的自由平等，已被滿洲政府從不平等條約裡賣與各國了，以致我們仍然處於殖民地之地位，所以我們必要救國。關於救國的道理很長，方法也很多，成功也很容易，兄弟本想和諸君詳細的說，如今因爲抱病，只好留待病好再說，如今先謝諸君的盛意。」同日發表入京宣言，大意一如上述之書面談話。

中山先生在廣州時，身體就覺得不太舒服。有人注意到：當他在臺上演講「三民主義」之際，不時用右手撫摸腹部。當時還以爲他講話的習慣如此，從未料想早已種下了病因。而其足以致命之處，正是他過去演講時經常撫摸的部位——肝部。民國十四年元旦，中山先生寄寓北京飯店，延請外國醫生六、七人，詳細診斷，考察病症，一致斷爲肝病；至於究竟屬於那種肝病，怎樣才能治療，則無一人敢於斷定。孫先生乃指定德國醫生克利負責診治，每日臨診一次。元月四日，哲嗣孫科偕上海各團體聯合會代表胡菊生抵達北京侍疾。爲求審慎醫治計，幾天以來，各同志又增請在北京著名的外國醫生會診。克利醫生將所有可治肝病的藥方，幾乎全都試驗過了，均無效果；又請俄國醫生協助，迭次提供意見，與克利互商參考。當時他的體溫升降的差距還不大，神志也很清醒。每天雖都遵照醫囑不見客、不談話

、多多靜養，切勿勞神傷氣。

不滿善後會議作法

但他有時仍不免用腦思考應付時局之道。而國民黨是否加入執政政府所壟斷的善後會議，顯然是一極待解決的難題，勞心焦思的結果，使他的病軀逐漸感到疲憊了。原來段祺瑞等人在中山先生病重時際，仍不放過他，針對他竭力主張的「召開國民會議」，段提出了召開「善後會議」，以「解決時局糾紛」，居然堅持主張不該反對帝國主義。被邀參加會議的，不但包括各省的直系軍閥，連革命叛徒陳炯明也名列其中。而擔任「善後會議」議長的趙爾巽，乃是前清東三省的總督、袁世凱的功臣。但從這些組成分子來分析，很明顯這是一個代表軍閥、官僚私利、坐地分贓的集會，它的目的在抵制國民會議。經過再三研商，國民黨終於決定不參加「善後會議」。一月十七日，中山先生在病榻中親自擬定了復電給段祺瑞，這是他生平最後一次的撰文，彌足珍貴。坦然指出：「善後會議所列構成分子，則似偏於實力一方面，而於民意方面未免忽略……但求善後會議能兼納人民團體代表……其代表由各團體之機關派出……至於會議事項，雖可涉及軍政、財政，而最後決定之權，不能不讓之國民會議。良以民國以人民為主人，政府官吏及軍人，不過人民之公僕。……今欲改弦更張，則第一着當令人民回復主人之地位，而使一切公僕各盡所能，以為人民服役，然後民國乃得名列其實也。」這種西方民主觀念的引進，當然並不為軍閥

、官僚集團的段派所接受。一月二十日，廣東國民會議促成會組織了十萬人的大遊行，公開反對「善後會議」。同月三十一日，中山先生指示國民黨員拒絕參加「善後會議」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根據指示，向全黨下達抵制「善後會議」的通知。二月二日，中國國民黨發表宣言，反對「善後會議」。三月一日，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平開幕，與「善後會議」對抗。

開刀發現肝已硬化

中山先生的病勢逐漸惡化，益形嚴重，體溫升降差距甚大，時而高達攝氏四十一度，時而降轉黃，已到不能進食的程度。德醫克利察覺到他的眼珠呈現黃暈，始知肝臟癱瘍，勢將擴散其他

內臟，此時非進行剖腹手術治療不可。但也考慮到他已是六十歲的老人了，惟恐其體力不勝支持，一時難決。二十六日，病勢加重，各醫生會診結果，咸認須即送醫院手術治療，經與家屬及侍疾同志商議，由夫人宋慶齡先勸割治，遂獲應允。當天下午三時，被送入協和醫院。由於當時救護設備未盡妥善，沿途震動，影響所及，體溫轉而增高，眼珠益見發黃，羣醫咸謂病入膏肓，宜速割治。經蒙同意，於下午六時許，由該院外科主任邵爾醫師操刀，施行剖腹手術，助理為劉瑞恒院長，乃中山先生至友。檢視全肝，堅硬如木，用肉眼就可看到肝部的惡瘤，立可斷為肝癌，確為不治之症，羣醫束手，無藥可救。醫生取下極微部分試驗，同時將肝洗滌後，把腹腔縫合。當天深夜，化驗結果，判斷患病遠因在十年以上，近因亦在兩三年之久，病至末期，扁鵲無策。

中外文庫

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教授著

定價台幣120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評述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闈、詹天佑、王闈運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壹佰貳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